

阶级、权力与文化：对“蚁族研究”的反思

叶荫聪*

【摘要】“蚁族研究”成为近年对大学毕业群体的公共讨论的学术基础。本文尝试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角度，审视这类研究背后一些未经反思的概念范畴。论文指出，“蚁族”这个概念掩盖而非揭示了当代中国变动中的阶级变动过程。要令社会科学视野具反思性，需要对相关现象重新概念化，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及阶层学术讨论，并把问题意识由针对一个特定群体，转移到更广阔的时空及政经脉络，尤其是对“文化”及“阶级”的新互动关系中。

【关键词】 大学生 中国 反思性 阶级 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6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1) 03 - 0108 - 15

一、有待反思的“蚁族研究”

“蚁族”一词由一位北京年轻学者廉思提出，指的是一群聚居在廉价出租房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自2007年底开始，他组织调研团队，在政府资助及自行筹措经费下进行调研，不单调查这些毕业生的人口、职业等特征，还有他们的性生活状态、社会不公平感、网络行为等。2009年9月他出版了《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2010年12月，又再出版了《蚁族II：谁的时代》。而调查的城市也由最初的北京，扩展到第三次大型调研的其他6个大城市。同时，廉思的调研也刺激起各地的“蚁族研究”。虽然廉思承认，他开展“蚁族”调查，是始于看到媒体报道，不过，各大媒体及网络反而是受到他的研究影响，纷纷以“蚁族”一

*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特任导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词作为焦点对象作大量报导与评论。一时间“蚁族”成了关键词，不管在中国的百度还是国外的谷歌搜寻器，搜索该词都会出现超过一千万条结果。

因此，这个词所掀起的关注，不单是媒体或流行文化现象，它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味道、有一定学术基础的社会热点。同时，廉思的研究设计及论述，亦具有相当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性质，不管是研究方法（问卷调查、量化统计分析等）还是理论，皆可看到他的学术面向。因此，比起其他同时期的关键词，它好像更具有学术性。而且，该词指涉的群体与其他底层群体，例如农民工及下岗职工一道，透过学术与媒体的中介，构成了中国公共论述中的社会现实。

既然“蚁族”有着学术研究基础，让各种论述能在这一基础上衍生，那么，我们有必要去探问它的学术研究基础。尤其是放在关心人类生存状态、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应该去问，它对我们既有知识体系带来什么新意？所谓“新意”，不独指新的发现，还包括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反思（reflexivity，另有译作“反身”），对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社会实践中的的人——的新认识。正如一位社会理论家指出，“反思性”是社会学 20 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成果（Therborn, 2000）。

有关“反思性”的理论性探讨在中国已有不少（陶东风，1999；肖瑛，2005；平锋，2009），尤其是对提出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已有相当介绍。然而，应用在中国的社会现象及社会研究中的还是相当少，而且也非常初步。本文将会从布氏的反思社会学角度去重新审视廉思的蚁族研究，除了点出当中一些未有反思审视的预设之外，本文还会以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的现象作为焦点，提出一系列研究问题及理论重构的可能，即未来研究的新议程。

二、反思社会学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社会学的反思性，是要尝试复兴社会学以至社会人文学科对社会实践（practice）的关怀。19 世纪以来，社会理论家面对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异化”（alienation），或用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社会（力量与形式）与个体生命的对立（Simmel, 1950: 58 - 84），一直尝试在重重理性制度（国家官僚制）与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及消费）之中寻找理解人（个

人或集体)的实践可能。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1972)。而且,社会学本身跟其他19世纪下半期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一样,自始便离不开现代国家行政权力(administrative power)的扩展。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19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行政权力,除了垄断武力手段维持其疆界内的“和平”外,另一特征就是制造庞大而纷杂的知识系统,控制、监视其疆界内发生的一切,如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等。这些知识体系的发展并不单是“关于”(about)其管治的对象,而且也建构生成(constitutive of)了这些被控制、监视的对象(Giddens, 1985: 180-181)。换言之,即以某些概念及范畴,包括经济学里的工资水平、资本构成与流动、生产总值等,也包括社会学关心的职业、阶级、性别、家庭结构等,以至心理学里对各种心理特征、偏差群体的分类,配以统计学的列表与计算,把生命与生活过程客体化(objectify)成社会、经济、心理特征的对象,亦成为各种规管与干预的对象。这也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的自17世纪便开始的生命权力(biopower),针对个别身体规训及总体人口物种的“权力—知识”关系形式(Foucault, 1980: 139)。

现代性的客体化(objectifying)力量总具有压抑或掩盖实践的倾向,因此,从布氏的角度看,社会学不免陷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大陷阱。前者借用统计学、民族志、模型建构等工具,把社会还原成模式或结构规律,视行动者(agent of action)为跟从规律的傀儡,把研究者的认知框架与主体实践的社会过程混为一谈,这在实证社会学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中都能看到这个趋势。至于“主观主义”,如社会现象学(social phenomenology)或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把社会结构视为个人利益、计算、意识的集合(aggregate)(Wacquant, 1992: 8-10; Wacquant & Bourdieu, 1992: 121)。解决这个两难,布迪厄不仅提出了他独特的社会理论来处理社会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更一般的反思社会学原则,作为方法论的议程启发其他研究及理论。

布迪厄指出,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就是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中那些未被审视过的思考范畴(unthought categories),以及特定思考范畴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Bourdieu, 1990: 178)。研究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家斯沃

茨 (David Swartz) 认为, 反思性可以分几个层面。第一是个人的社会定位 (阶级、性别、种族等) 对研究对象的投射; 第二, 研究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位置, 特别是学术及政治圈这两个场域, 因为, 社会学研究者总是离不开它们, 总是在其中竞逐; 第三, 考察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如何获取客观性, 得以被承认与取得合法地位的条件是什么, 包括认识论与社会条件 (斯沃茨, 2006: 310 - 312)。这种反思除了指向社会学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sociology), 例如布迪厄的《学术人》(Homo Academicus), 更重要的是把追求科学的对话讨论, 置放在理论及实践的互动之中, 而非用独断封闭的理论取替动态。

布迪厄提出的反思社会学, 兼具位置性反思 (positional reflexivity) 及文本性反思 (textual reflexivity), 前者针对研究者的位置合法性及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后者质疑文本与对象的对应 (correspondence) 关系, 即学术的书写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差异与鸿沟。麦克白 (Douglas Macbeth) 指出, 两者皆建基于学术专业的怀疑论 (skepticism), 对自身知识体系的怀疑, 这本身便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一部分 (Macbeth, 2001: 55)。所谓“现代知识”不只是学术知识, 还涉及常人如何应对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 换言之, “反思”的需要, 与现代性的转变有密切关系。

社会学家贝克 (Ulrich Beck) 等指出, 现代世界进入他所称的“反思式现代性”或“再现代化” (re-modernization), 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社会演化的新阶段, 而是社会组织及文化想象的本体转变 (ontological change), 即空间与时间的转变。换一个简单的说法, 是个人及组织如何感受、呈现、看待、经营及改造自己身处的社会及历史 (Beck et al., 2003: 10)。过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性”以理性、资本、科技力量, 呈现与建构一个可以透过人类力量驾驭 (mastery) 的现代秩序, 甚至认为可以在非西方地区复制、推广及培植。“反思式现代性”则是对这种驾驭的怀疑, 正如拉图尔 (Bruno Latour) 所说, “再现代化”指的不是现代世界愈来愈失控, 而是人们日益强烈意识到种种失控, 因此, 对自身的知识体系有更强的反思需要 (Latour, 2003: 36)。

从反思的角度看, 中国作为一个晚发展国家, 亦无可避免地身处“反思式现代性”中。以现代化的演化论观点看, 中国是个比西方国家发展“起步较慢”的国家, 但是, 当西方现代化论的演化图式遭到质疑后, 我们便愈来愈不能这样看自己的国家。不过, 这并不代表了西方所创发的现代性体制 (资本主义、民族国

家、都市文化等等)已没有影响力,而是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些体制部分被重新组合,并嫁接在不同的文化想象之中,扣连上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指向被期待又不可知的未来(Beck et al., 2003: 10)。因此,中国跟其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政府)一样,强调不同的现代性(modernities),例如所谓“中国模式”或“亚洲价值”等等。不过,众多新现代性的呈现,虽不可能重复旧日西方国家经营普世性的现代化论模式,但却有着各种西方体制的变形与组合。而当中又蕴含着无法完全驾驭与控制的焦虑,特别是代表着政治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及其行政权力,因此,同样需要反思自身的需要。回顾现代及当代中国各种频繁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我们不难体会反思的需要。

本文尝试运用布氏的反思社会学,在“蚁族研究”中点出或未经审视的位置及概念范畴,然后再由此出发,提出一些在“蚁族研究”中被掩盖或转移了的研究问题与课题,特别是由大学毕业生所衍生的问题意识,同时,在结论部分略论它们对回应中国反思式现代性有何增益。

三、反思“蚁族”与转型期行政权力

由以上的理论及社会脉络出发阅读《蚁族》及《蚁族II》,我们可以首先分析其研究者的发言位置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从个人位置看,以调研团队的发起人及负责人廉思为例,他强调自己有着“与我同龄的人的情感”(廉思,2009: 13),即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政府自1999年扩大招生后的大学生,廉思可能算是最早的成员。他们有着过去中国大学生作为社会精英的身份。廉思作为一位毕业于中国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干部兼党员,毕业后当过短暂的湖北省某市长助理,可以说是出身自中国大学体制的精英代表,他们相对快速地体验了精英阶层向上社会流动的过程。然而,他所身处的群体却也急速膨胀,以至动摇了大学毕业生在社会阶梯中原有的优势位置。因此,当廉思发现了许多与他类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并没有经历与他类近的社会流动过程,他便能体验到明显的距离感与差异。他指出,自己是从一篇新闻杂志报导中“发现”了“蚁族”的,他当时十分惊讶,他说:“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廉思,2009)换言之,即一种

自身群体中的距离感。也许在这种共性及差异中，他对这个群体充满了同情以及好奇，故此，他很快便认定了他们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及关心的群体，甚至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廉思最初的问题意识是由自身看到别人跟自己的差异，看到同代人无法获得像自己那样的向上层社会流动，这些在社会流动上遇上挫折的大学毕业生，便一下子成为他的目光关注所在。很明显，廉思的客体化举动转移（displace）了自身在体制里或社会里的结构性位置，他没有反过来质问：自己或他以前的大学毕业生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社会流动的？相反，他只好奇他们在怎样的处境下无法流动。这不是说廉思不诚实，因为，这种转移不单是个人的，还是在一定特定场域中发生的，而背后亦反映出廉思跟政府官员的共同期望及预设——一个预期稳定成长的中国社会，它既体现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体现在社会持续向上流动之中，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成就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化城市社会。只有这种预设，反能转移对自身所在结构的反思，才能把那些无法向上流动的视为“问题”。

廉思在书中其实非常坦白，他说，当他设计研究时，于2005-2006年担任广水市市长助理的经济社会调查经验是他的基础，同时，据他所说，北京市委领导也刚巧找到他就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调查，因此，他作为同龄人群体中的精英目光，与政府及媒体的目光便扣连起来。在《蚁族》一书中，廉思已说明，他的调研建立在流动人口管理的工作上，并向北京市委乃至国务院提交了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及建议（廉思，2009）。《蚁族 II：谁的时代》更详细记录了自2009年夏天开始，廉思陪同北京市委等领导探访他第一次做调研的唐家岭村，同时，媒体亦持续环绕着“蚁族”来大量报道。2009年底，廉思曾撰写《“蚁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相关对策建议》，经中宣部提交给中央，包括共青团、政法委、人大常委、公安部及中央维稳办等。

一方面，廉思的眼光或凝视（gaze），结合了大学毕业生群体中的精英者位置，以及政府及媒体位置，聚焦在这些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流动挫败上，同时，又聚焦在“聚居”的年轻人，因为，聚居的流动人口及所在地是北京市委最初的关注所在，也是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关注所在。另一方面，对凝视对象的客体化，亦深深融入及进一步延伸现代行政权力的监督、管治技术之中，即所谓“经济社会调查方式”，以量化统计及问卷调研方式把研究对象呈现出来。

很明显，廉思的位置、发问位置及研究设计，都坐落在国家以统计方法进行的社经调研领域之中，而这个领域正是中国进入全球现代性过程中为人忽略的一面。刘新在新著《中国的幻象》（*The Mirage of China*）一书中，从国家统计学及统计单位的角度切入，分析了这个过程。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单是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且是中国治理（governmentality）如何从苏联式计划经济转向政府调节及主导的市场经济。过去的国家统计，单纯依赖国营单位官僚层级数据汇报的系统。然而，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营单位汇报系统便不足以达到西方现代国家对统计的要求，各级国家党政机关需要持续以统计方法呈现及监控自身经济及社会运作，并由此干预经济及社会，它是一种向自己及全世界呈现一个崭新“中国”的技术，也是规范及干预“中国”自身的手段（Liu, 2009a）。不过，这个过渡并非单纯的“与世界接轨”，建立一个专业的统计团队及体制。因为统计部门及工作所呈现的“中国”，例如 GDP 持续增长，是中国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部分，也是其管治策略，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发展主义的一部分，故此，统计工作需要与党政领导持续协商。在廉思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他有非常强的动力，对低收入大学生毕业群体各个面向进行统计学式的再现与论述，而且，背负着行政权力对被管治对象的驱力。例如，由于北京市政府与其他中国城市政府一样，其体制与政策干预仍在户籍制度中运行，所以，大学毕业生首先是以“流动人口管理”的面目出现，因此，在“聚居村”居住的大学生率先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蚁族”远非一个严格的社会学理论概念，廉思没有交代过他在研究前是如何透过理论得出来的。若廉思关注到这些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晋升出现问题，“蚁族”这个概念也并非必然之选。例如，他本可以“阶级”或“阶层”概念及理论来界定他们，从生产关系及过程入手，或以收入分配的分层（stratification）作界定，把大学毕业生视为一众从事服务业的白领阶层，尤其是低端服务业的白领，不管他们的学历以至居住形态。可是，廉思却一开始便认定了这样的一个聚居群体，显然受制于地方行政权力对城中村的“凝视目光”，只有在这些城中村聚居的才是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的。此外，既然聚居形态是其中一个“蚁族”界定原则，那么，他本应该对聚居空间有更细致的描述及资料搜集与整理，可是廉思的研究却没有，问卷调查中似乎只有“居住情况”，包括居住面积及

租金等等，其余便是受访者对治安、卫生等的评价（廉思，2009）。同时，他对社区的分析亦欠缺。北京唐家岭是他们第一个调查的村落，但在廉思等人的分析中几乎不存在这个城中村。事实上，唐家岭是个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城中村，因为它既邻近中关村的资讯产业，又邻近大学，并与近年发展起来的回龙观住宅社区靠近，它在北京城的产业发展及空间变动中有独特位置，而2010年，唐家岭开始拆迁改造。可见，廉思以“蚁族”来把这些被研究对象客体化，把他们孤立的具体空间及政经脉络之外。

相反，廉思引导我们认为，“蚁族”是一个调研统计后得出的结果，当中提及的三个特征形成一个有固定关系特性的群体。可是，他不单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统计学上说明过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个强的关联性（correlation）。例如，廉思的研究并没有把样本与同年龄不同学历、收入水平、不同居住条件的样本作比较，因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作为一个由研究者界定的群体，他究竟是一个阶层，一个世代，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一个过渡阶段？廉思自己承认，这个群体还没有形成社会阶层，而是一个现象，绝大多数人是大学毕业后2至4年，5年以上的人很少（廉思，2009）。再细心看他调查的“婚恋困境”（一半人没有伴侣）、“性缺失”（缺乏性生活）、网络依赖等，显示的所谓较高程度，通常指与大学生、成人或全国平均作比较。但是，究竟这是年龄层的共性，是阶级、阶层特性，是居住空间特性，还是“蚁族”的共性，也没有统计资料及分析清楚说明。因此，这是否是一个有共同而又独特的经济利益或意识的群体，究竟能否称为“族”，颇让人怀疑。换言之，廉思在没有理论作基础，亦无复杂的统计分析的情况下，从自己搜集来的统计资料中，自行拼出及认定了一个群体。

如此认定一个群体，又缺乏理论基础作支持，难以看到其主体实践面向，特别是涉及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meaning），因此，研究对象的“行动”（action）被化约成回应外在环境的“行为”（behaviour）。我们只看到受访者如何回答研究者加在他们身上的认知架构（体现在问卷上），而看不到他们的认知及情感结构，也难以看到他们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互动。例如，我们知道他们收入很低居住环境狭小，但究竟他们在身处的环境中如何看待自己的穷困？就连他们是否觉得是过渡阶段，是否觉得自己本该如此，他们与谁作比较？我们也不能掌握。我们知道他们有多大程度依赖网络，我们却不知道网络对他们的意义。廉思调研十分

关心“蚁族”的网络集体行动倾向（廉思，2010），可是，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集体”（更不用说“组织”了），在具体事件中的“行动”是什么，我们无法得知。他只仰赖 20 世纪 60 年代斯梅塞尔（Neil Smelser）有关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价值累加理论”（Smelser, 1962）来分析与预测他们的“行动”取向，这里便有把“行动”与“行为”混为一谈之嫌。在西方社会学界，1970 年代以后，已转向集体行动在组织理性、资源动员、政治机会及文化身份构成中如何出现（Gamson, 1988；McCarthy & Zald, 1977；Melucci, 1996；Olson, 1965），取代了早期的“集体行为”的理论模型，注意不同的集体构成的过程。

以上讨论，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廉思的研究价值，事实上，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一个为人所忽略的现象。本文的目的是点出他在概念化、研究及分析中存在许多未经反思的概念范畴。由于这些未经反思概念范畴的存在，大学毕业生所身处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反而被隐去，被转移、化约、想象成一个特定群体的特有现象。要理解急剧增加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新现象，首先需要更具批判性及反思性的问题意识及理论概念。而在廉思的论述中，我们特别看到“阶级”如何被置换。以下我将尝试就这个面向，结合国内与外国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意识以及将来可能的研究议程。

四、阶级与文化

正如以上所说，廉思的“蚁族”概念构成掩藏了阶级面向。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大量出现的大学生，为中国的阶级认同、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至社会流动带来新的冲击。要明白大学生群体的重要性，需要了解有关当代中国的阶级研究及讨论。

中国在解放后，虽然城乡差别被制度化下来，但是，在农村与城市内部，有一种“去阶层化”的倾向（Whyte & Parish, 1984）。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及生产队中的农民是获取工分的社员，透过资源再分配获得生活所需，城市居民多是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即使是在开放改革的初年，农村改革带来的财富积累也相对平均化，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化还未充分展开（李实，2000）。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以倪志伟（Victor Nee）等为首的美国社会学界开始研究中国的市

场过渡或转型 (market transition) 问题, 特别关注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及不平等, 他特别关注干部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的消长, 分析他们的收入分配变化。他当时指出, 市场经济会渐渐削弱干部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新民间精英会取代旧的干部精英 (Nee, 1989)。

然而, 倪氏的研究结果遭到不少学者挑战, 他们指出了市场转型的不同进路 (penetrations), 当中涉及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资本的构成、市场的结构等等, 它们会带来不同的阶层收入分配 (Szelenyi & Kostello, 1996; Walder, 1992; Oi, 1992)。事实上, 直接生产者如农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的市场化中, 是持续的社会底层, 而掌握行政资源的干部精英及家属, 又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中取得优势。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阶级或阶层分化已受到学界关注, 例如陆学艺等的研究指出, 约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与“农民工”处于中下层及底层, 只拥有极少的组织、经济及文化资源, 与占全国人口 3.6% 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及“经理人员”形成强烈对比 (陆学艺, 2002)。

社会学者边燕杰指出, 市场经济模式及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很好理解中国阶级结构的工具, 因为同一收入或职业的人并不必然成为群体, 并不具有类近的社会位置或经验, 因此, 需要参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 集中探讨社会关系及产权结构 (边燕杰, 2002)。由此我们需要理解, 大量大学毕业生的出现, 不单是教育政策的结果, 其实也伴随着社会关系及产权结构的转变。在 2000 年以前的社会分层研究中, 并没有把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视为一个独特的阶级群体, 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 以及较容易获得城市资源, 例如城市户口、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等, 乃至国家资源如国营企业及政府公务员职位, 因此成为新精英阶层, 或是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 (李强, 2001; 周晓虹, 2005; Li, 2010), 与农民、农民工、工人 (尤其是 1993 年以后国企改革下岗的工人) 形成明显的差距。可是, 随着 1999 年以来的扩招, 当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 失业人数上升, 实质工资不断下降, 接近农民工及工人水平时, 城市的阶级结构便会产生变化。

产生的变化不单是量方面的变化, 例如增加了社会底层的人数, 或所谓大学生无产阶级化, 而且, 亦是阶级结构及关系的改变。大学毕业生的工作, 一般不是工厂车间及服务业的体力劳动, 而是服务业的脑力劳动, 大部分处于低端层级, 例如文书处理、客户服务、程式编写等等。换一个说法, 则是非物质生产

(immaterial production) 的劳动。根据哈特 (Michael Hardt) 及奈格里 (Antonio Negri) 的说法, 这类劳动包括两个面向, 一为认知性及语言活动, 需要处理大量符号资讯, 无论是资料存档或电脑程式编写。在这些劳动者当中, 有相当数量是基层劳工, 属邱林川所说的非精英的知识劳动者 (non-elite knowledge worker) (Qiu, 2010)。另一类为情感劳动, 涉及身体及心智, 例如客服中心的工作, 除了处理资讯外, 就是要以高度操控的语调、表情、情绪、仪容、穿著、姿势取悦客人 (Hardt & Negri, 2004: 108)。相比起物资性生产劳动者如车间工人, 他们身处于一个更为庞复的层级及分工组织之中, 更被区隔甚至个体化, 他们有“自我程控”的特性, 却又受到更全面的资讯化监视身心。虽然原则上他们可能更有能力以资讯科技来产生虚拟的社会连结等等。在这些新的技术、生产及社会关系中, 他们的阶级定位及关系有何特性? 有关哈特及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我国有不少理论性探讨, 但经验研究还是欠缺, 若能结合政治经济学及阶级理论来研究大学毕业生的非物质劳动以及阶级认同与关系, 会是相当有潜力的研究。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注意, 这类非物质生产及劳动属广义的“文化”, 它不单在文化生产中与阶级位置、身份及关系发生作用, 也以文化资本构成阶级。有学者指出, 从心理上, 白领阶层多属于由“人力资源”(即受过高等教育)进行自我界定(陈天柱、苏祥, 2010)。而大学教育作为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直至2000年左右, 在有关中国城市居民的研究中, 教育因素对收入增加还是有相当重要的贡献(Maurer-Fazio & Ngan, 2002)。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方面颇容易理解, 在开放改革至1999年期间, 由于中国的高等院校人数增长相对稳定, 相对经济总量的增长未有超前, 大学毕业生容易在城市中取得持续的收入增加, 晋升至中产阶级甚至以上。而按社会学者刘欣的框架来分类, 他们是没有掌握到公共资产, 却有市场能力的阶层中的低级专业人员(low-level professional)(Liu, 2009b)。根据统计数字, 近年大学生刚毕业后实质工资呈下降趋势, 市场能力下降, 愈来愈多的人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不难预计, 文化资本对阶级晋升的作用在下降, 或者更准确地说, 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更复杂的变化, 具体变化需要更细致的经验研究, 包括统计调查的量化分析及质性研究。例如, 文化资本中的差异性很可能拉大, 如重点大学毕业与非重点大学毕业之间的差距, 甚至是在中国大学毕业与外国大学毕业回国之间的差距等

等。至于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及重要，例如，农民及工人子女是否已无法透过大学渠道获得阶级晋升？何种背景的子才可以从文化资本中获得阶级地位提升或巩固？这一切都涉及阶级及阶级结构的动态再生产（reproduction）。

因此，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代中国阶级身份及关系如何透过“文化”在生产关系以至日常生活领域中构成与再生产。正如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所指出的，阶级是活出来（lived）的关系，涉及人如何进入某个特定位置及关系，因此，总是关于特定时间、空间及意义的（Thompson, 1968: 10 - 12）。社会学家汉莎（Amy Hanser）曾在中国城市进行田野考察。她指出，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在中国资本主义进程中发展出一套文化及社会“资格结构”（structure of entitlement），用来理解、应对及合理化群体之间的阶级不平等（Hanser, 2008），即不同文化“素质”的人各有“应有”的社会位置及位阶。这个发现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相吻合，当中最早及比较多人研究的是属于底层的“（农）民工”，最著名的研究是李静君及潘毅的研究，两人皆指出，民工（尤其是女性，即“打工妹”）在工厂劳动及工厂区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受制于地方性的专制主义（local despotism）的工厂体制，她们的农家身份及年轻的形象及身体，不断被强化成“不成熟”或少不更事的性别身份，成为被要求改造，追上现代化生活、工作伦理、身体操练的“打工妹”，与代表“现代”的企业家及管理阶层形成“现代”与“半现代”的差别与关系。可是，在她们的薪资劳动过程中，她们与这个想象中的“现代人”之间的距离又不断被拉大及放大，她们好像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现代人”，这具体体现在那个半隐半现的“农民”标签上（Lee, 1998: 129; Pun, 2005: 115 - 118）。严海容在她的城市保姆的研究中甚至认为，“农村/农民特性”（rurality）的转变是当代中国现代阶级转变中的一部分，相对想象中的“城市”，一种被认为是“农村/农民主体性、惯习及实践”被编织进当代中国的都市生活中，那些从农村来城市当保姆的人，无法摆脱“农村/农民特性”，被认为是“素质低”的群体，于是，一种环绕着“素质”的资格结构便在阶级差异及不平等中形成（Yan, 2006）。这些观察放在与日俱增的大学毕业生身上便很有趣。大学毕业生跟农民工不一样，他们获得了高等教育及城市文化洗礼，在“素质”上好像不成问题，在学历及文化资本上跟事业相对成

功的中产者没有太大区别，可是，经济收入以至劳动条件却处于低层，这会对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格结构造成重大的改变，也同时冲击着阶级不平等及差异的合法性，因此，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经验角度看，中国的阶级结构与关系会有新的变动，有待更多经验研究的探索。

此外，阶级关系及划分，亦会深深嵌入社会空间之上，例如，不同的城中村的聚居群体其实不如廉思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北京浙江村，由于地理位置、服装产业、户口制度，形成了非城市居民的跨阶级同乡群体（项飏，2000；Zhang, 2001）；而广州石牌由于邻近资讯产品市场，成为资讯社会的草根劳动阶级及网络，他们与城中其他阶级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习性及印记（Qiu, 2009）。在大量低薪大学毕业生出现的背景下，“社会及文化的资格结构”变动会如何？阶级的区隔又有什么变化？这些将会是很值得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只是关于已经获取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的研究，如张鹏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置业者的研究，她基本上确认了“文化及社会资格结构”的说法。进入2000年以后，房地产业愈来愈注重“文化品味”，不管是广告或实体设计上。而住户日常生活圈限在小区内，处于空间及生活文化的区隔，与外面其他住宅社区及外人产生清晰的边界；同时，他们在小区内的生活，也充满了阶级文化区分，例如住户作为城市中产者与带着民工身份的保安、清洁工人、保姆等在社会职业角色及文化层级上截然区别开来（Zhang, 2010）。这些中产阶级与聚居在非正规化、阶层位阶较低的社区的大学毕业生，如城中村或贫民窟，将会产生非常有趣的对比，他们如何面对那些跟他们文化资本相若，但又处于不同空间，较高社会及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他们如何重新调整以上所说的“素质”结构？以及改变阶级的区分及空间区隔？并从而重新商议或甚至质疑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五、小结：反思现代性与中国

本文尝试指出，“蚁族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把握当代社会动态，而在于启发我们注意到一些未经反思的概念范畴，尤其是“蚁族”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掩盖了当代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因此，若大学毕业生的增加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值得关注，对理解当代中国现代性有意义，那么，其中一个

重要问题是要把他们放回到阶级在新的社会及政经脉络里的意义。

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出口加工生产主导迈向了消费型的城市经济。所谓刺激“内需”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现代化过程。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既为人力资本投资，也为教育消费的刺激，从而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不断增加，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打造现代社会的标记。不过，反思性的要求令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现代化本身便是一个不能完全驾驭的过程，需要对当中各种各样的“副作用”（side-effects）保持醒觉。在当代中国大学毕业生现象中，我们既要注意造成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势头（Bai, 2006），同时，那些好像未能赶上现代化大潮的人及群体，其实不是“他者”（others），而是“我们”现代性的一部分，他们是中国这个变动中的阶级社会的一部分。

因此，值得反思及关注的不是“蚁族”本身，而是“蚁族”背后那个充满变数、未能确定的现代化过程。本文认为，大量涌现的大学毕业生正是这个捉摸不定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建立具反思及批判的认识，问题意识的焦点应调校到“阶级”与“文化”之上，即文化作为广义的非物质生产与劳动，作为阶级结构及关系构成的文化资本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中的阶级经验结构。一系列具反思性的社会学探索，正需要由这个焦点展开。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2002). 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边燕杰编.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陈天柱、苏祥 (2010). 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其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2.
- 李强 (2001). 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 厦门: 鹭江出版社.
- 李实 (2000). 城乡个人收入比较. 熊景明编.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农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廉思主编 (2009). 蚁族: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廉思主编 (2010). 蚁族 II: 谁的时代.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陆学艺编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克思 (197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品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平锋 (2009). 布迪厄及其反思社会学理论. 经济与社会发展, 7 (6).

- 斯沃茨 (2006).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陶东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陶东风 (1999). 社会科学的反思性——读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引论》. 开放时代, 4.
- 项飏 (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北京: 三联书店.
- 肖瑛 (2005). 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 国外社会科学, 2.
- 周晓虹编 (2005). 中国中产阶级调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ai, L. (2006). Graduate Unemployment: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85: 128 - 144.
- Beck, U., Bonss, W. & Lau, C. (2003). The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roblematic,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 (2): 1 - 33.
- Bourdieu, P.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80). *The Will to Truth*.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Gamson, W. A. (1988).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Klandermans, B., Kriesi, H. & Tarrow, S. Ed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ume 1: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Greenwich: JAI Press.
-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ume Two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nser, A. (2008). *Service Encounters: Class, Gender, and the Market for Social Distinction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M. & Negri, A.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Latour, B. (2003). 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 How to Prove It? A Commentary on Ulrich Bec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 (2): 35 - 48.
- Lee, C. K.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1): 3 - 33.
- Li, C. (2010).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iu, X. (2009a). *The Mirage of China: Anti-Humanism, Narcissism, and Corpore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 Liu, X. (2009b). Institutional Ba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In Wang, F. ed.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beth, D. (2001). On “Reflexiv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wo Readings and A Third. *Qualitative Inquiry*, 7 (1): 35 – 68.
- Maurer-Fazio, M. & Ngan, D. (2002).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Davidson Working Paper Number 508. New York; Davidson Institute.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6): 1212 – 1241.
- Melucci, A.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663 – 681.
- Oi, J.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on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1): 99 – 126.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 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n, N. (2005). *Made in China: Subject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Qiu, J. 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 Qiu, J. L. (2010). Network labour and non-elite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and Globalisation*, 4 (2): 80 – 95.
- Simmel, G. (1950).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Eighteen-and Nineteen-Century Views of Life: An Example of Philosophical Sociology.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mesler, N.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London: Routledge & Paul.
- Szelenyi, I. & Kostello, E.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1082 – 1096.
- Therborn, G. (2000). At the Birth of Second Century Sociology: Times of Reflexivity, Space of Identity, and Nodes of Knowled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37 – 57.
-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acquant, L. J. D. (1992). To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ourdieu’s Sociology. In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cquant, L. J. D. & Bourdieu, P. (1992). The Purpose of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Workshop). In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der, A.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24 – 539.

Whyte, M. K. & William L. P.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n, H. (2006). Rurality and Labor Process Autonomy. *Cultural Dynamics*, 18 (1): 5 – 31.

Zhang, L. (2001).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Zhang, L. (2010).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